



Max Weber

韋伯

鄭涌／著

韋伯

- 1864—1920
- 德國人
- 著名社會學家
- 著有：《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關於理解社會學的若干範疇》、《經濟與社會》等。

西方思想家寶庫



韋伯 Max Weber

鄭涌著

BWA/280/0508

中華書局



西方思想家寶庫

□ 叢書策劃：危丁明、盧建業
□ 責任編輯：羅國洪

韋伯
Max Weber

□

著者

鄭涌

□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馬坑涌道SB-SF 2樓

□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

海濱工業大廈4樓B1

□

版次

1994年7月初版

© 1994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183 0

主編的話

思想文化屬於歷史範疇，是人類創造的積累和歷史發展的結晶。任何一種思想或哲學體系，都是當時政治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同時又是繼承前人思想資料發展的結果，有自己獨立發展的道路，並對當時社會及後世人們的思想發生重大影響。

人類思想和文化的發展，有個性也有共性，有民族（或地域）性和互相溝通的共通性。任何一個民族的思想文化都有其優點和特點，也有其不足，都可以而且應當在同域外的交流中取長補短，使自己的思想文化不斷更新發展。如中國漢唐文化的繁榮，固然是當時政治經濟發展的反映，但與那時吸收西域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有密切關係。宋明理學吸收佛教思想中的哲學素養，造成中國哲學發展的新高度。

明清時代，西方傳教士東來，並沒有使基督精神代替中國的儒學傳統，卻帶來天文曆算測量等科技文明。又如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同樣是兼容會通的結果。它不僅繼承了古希臘文化、基督精神和羅馬法，而且經過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使人本主義代替神本主義，人權、民主和科學精神應運而生。中國儒學也受到西方思想家的重視，這在伏爾泰、盧梭、魁奈和黑格爾等人的著作中均有反映。

在中國近現代，由於外國列強侵略壓迫，先進的中國人爲救亡圖存而努力向西方學習，從希臘哲學到文藝復興、啓蒙運動以來的許多思想學說都介紹到中國，並與中國的社會變革相結合，引起中國思想和文化的深刻變化與發展。

現在，西方名著差不多都已翻譯出版，研究論著和思想家傳記也出版不少。這當然是很好的，有益的。但仔細考慮似也有些問題，就是基本上多流於艱深，從思想史角度討論多，或主要是對其思想的述說，而從某種思想與實際生活關係這方面展開較少，是其不足。

有鑒於此，我們編寫這套《西方思想家寶庫》，就是試圖彌補這個不足，把重點放在從社會的角度來討論思想，引入各種材料，以期說明某種思想發生、發展的

背景，它所要回答的歷史問題、社會問題，並說明這種思想所引起的社會作用。

人們的宇宙觀、人生觀與哲學密不可分，特別是近現代西方哲學，它所圍繞解決的問題往往就是人生存在及其價值的問題。所以，我們在這套叢書中力圖注意解釋對於人生有基本指導意義或參考價值部分，聯繫哲學家或思想家的行止實踐，然後向讀者具體呈現其中的啟示，或可供思考的問題。

在編寫體例上，這套叢書每書的內容基本上分四部分：(一)時代背景及氛圍；(二)思想家的生平簡要介紹；(三)思想體系及觀點說明；(四)影響。為使讀者便於較全面了解某思想家，不僅要介紹其本身의思想和活動，還要旁及當時各式各樣的思潮和爭論的問題；突出為何他會產生那樣一種思想體系，與其經歷、體驗的關係；分析在衆多思潮中，緣何某種思想會顯得突出和自成體系，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如何；討論某種思想體系的影響，涉及其時及當代的影響，對其他學科如文學、美學等的影響，對方法論、人生觀的影響等。

這套叢書共十種。包括盧梭、黑格爾、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杜威、韋伯、羅素、薩特等著名思想家，以及這九位思想家的名言錄。在編寫中，儘管我們努力

想寫得簡明扼要、生動活潑些，在不大的篇幅中能使讀者得到較多有益的東西，但由於我們的水平所限，仍難免有不當之處，尚盼讀者指正。

丁守和

一九九四年四月於北京

目錄

第一章 「韋伯復興」

一、「韋伯復興」在德國 4

二、「韋伯復興」與歐洲社會主義的命運 16

三、「韋伯復興」和日本、中國的現代化 23

四、小結 34

第二章 韋伯時代的德國

一、政治及社會背景 39

二、經濟情況 52

三、人文思潮的發展 63

第三章 韋伯的理解社會學

一、社會行爲 94

二、意義和因果關係 111

三、理解 and 解釋、說明

121

第四章 韋伯其人

137

一、韋伯的早期經歷與宗教倫理觀的形成

139

二、韋伯的學術生涯

144

三、韋伯的政治生涯

150

四、小結

158

韋伯年表

161

參考書目

165

第一章

「韋伯復興」

通常，國際學術界把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稱為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思想家。但是，被戴到韋伯頭上的桂冠遠遠不止這幾項，還有諸如法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之類。主要原因是，韋伯被認為是現代社會科學領域中開一代風氣的人物，他的著述在上面提到的各個領域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儘管如此，給韋伯戴這麼多桂冠，決不是沒有爭議的。比方說，在關於韋伯是不是一個哲學家的問題上，兩位現代德國著名哲學家的看法就針鋒相對，K·雅斯培爾斯認為，韋伯「是我們時代唯一不同於今天一般哲學家的哲學家」，是「存在主義哲學家的化身」。而H·李凱爾特則批評雅斯培爾斯說：「您把韋伯稱為哲學家，這是毫無道理的。」

不過，韋伯在西德受到廣泛的重視並進行研究，那是在他逝世以後近五十年的事了。一九六四年，韋伯誕生一百週年的慶祝活動，在聯邦德國拉開了「韋伯復興」的序幕，雖然，在這之前早已未雨綢繆。六年之後，韋伯逝世五十週年的紀念活動又推其波助其瀾。被人們遺忘了幾十年的韋伯像考古文物一樣，突然被發現和被挖掘出來，並引起人們廣泛的興趣，隨後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一股被稱之為「韋伯復

興」的研究和爭議韋伯的熱潮。

一、「韋伯復興」在德國

一九八九年，前後在德國發生並擴大到歐洲乃至世界的大變化，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一次：蘇聯和西德由對抗、冷戰走向對話；東德執政的共產黨落選下台，東德投入西德的懷抱，從而實現了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第一次統一；一夜之間，其他大部分的東歐執政的共產黨紛紛丟掉了政權，少數仍執政的也允許了反對黨的存在，連過去一貫唯我獨革、到處樹敵的阿爾巴尼亞也不得不改弦易轍；這一風潮波及亞洲、影響全球，舊的歐洲乃至全球戰略格局被打破……

這一變化，與六十年代以來西德經濟的高速發展是分不開的。由於西德的特殊地理位置，它處在「北約」與「華約」歐洲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兩大軍事集團冷戰和對抗的前沿。出於這種冷戰和對抗的需要，以及西德人想一洗第二次世界大戰失敗的耻辱等原因，大量的物力和人力被集中於投入西德的重建和復興工作。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變成了一片廢墟的西德土地上，崛

起了一大經濟強國。這一強國不僅在經濟上遠遠地超越了作爲它的歐洲主要競爭對手英國和法國，而且直接威脅着美國的世界經濟霸主寶座。衆所周知，美國、英國、法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敗了德國，並在西德駐軍至今。這就是說，美、英、法三國眼睜睜地看着，西德是如何在它們的鼻子底下，迅速地趕上甚至超越它們自己的。西德得到了復興，德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西德作爲名副其實的經濟第一強國而稱雄於歐洲。這是西德以經濟實力而求民族生存、民族發展，維護民族尊嚴的方針政策的成功之處。當然，採用這樣的方針政策，可以說是迫不得已（例如西德作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被剝奪了軍事發展、軍備競賽的權利等等），可以說，除了發展經濟以增強民族實力之外，別無他途。不過，西德的成功，也標誌着一個觀念的根本改變，即所謂「實力」，主要是經濟的，而不再主要是軍事了。經濟的強盛是根本的強盛，軍事的、政治的強盛，無一不是以經濟的強盛爲基礎；同時，也說明了：與一個民族的經濟實力不相符地、超出了本民族經濟上的承受能力的擴軍備戰，其結果反而是削弱了本民族的經濟實力，這是某些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所始料未及的。

「韋伯復興」，正是出現在這樣一個西德經濟強盛、歐洲戰略格局發生根本性變化之初及其過程之中。顯然這決不是偶然的。可以說，在根本上，「韋伯復興」正是這種大變化的一個理論的和學術的表現。

西德人「復興」韋伯，主要不是從其學術的角度。這一點，在「韋伯復興」的一開始，就被這一「復興」運動的主要發起者、參加者說得清清楚楚了。例如，在為紀念韋伯一百週年誕辰編輯的《馬克斯·韋伯紀念文集》的初版序言中，著名社會學家R·柯尼希強調指出，參與這本紀念文集編撰的幾位主要人士、當然也是西德幾個主要的韋伯專家有「一個共識，即：馬克斯·韋伯不僅對學術，而且恰恰是對整個德國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柯尼希特別提醒讀者要注意，一九六四年德意志共和國和德國民主制的命運，和一九二〇年韋伯逝世時很類似：正是在這樣一種形勢下，人們有必要重溫韋伯的遺言，認清德國的命運和前途，為德國的強盛而進行抗爭。柯尼希的這個序言，為我們瞭解六十年代西德「韋伯復興」的起因、「韋伯復興」運動發起人的意圖，提供了一個重要文獻。

為了進一步深入理解，什麼是韋伯「對整個德國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我

在這裏簡略地介紹一下韋伯關於民族發展的主要思想。

照韋伯的看法，民族的發展過程也就是謀求實力的爭鬥過程；民族的實力利益是經濟政策應當爲之服務的最後的和決定性的利益。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經濟政策學是一門政治科學。它是爲民族實力政治的永恒利益服務的，而不是效力於帝王和統治階級的一般政治。國家是世俗的實力組織。所以，「和平的」自由經濟競爭，實際上會有助於最優民族的勝利。因此，今人要爲後人提供的，決不是那種被和平外表所蒙蔽的、所謂人類的和平與幸福的美夢，而是爲保持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優秀素質和品格所進行的不懈的現實爭鬥。

任何國內或國外政治，首先是民族、階級或個人之間的爭鬥。這種爲爭奪實力、權力的爭鬥，是政治的永恒因素。一個民族有沒有政治天賦，就表現在它有沒有爭奪實力和權力的願望；一個沒有實力和權力願望的民族或個人，是沒有政治天賦的。沒有這種政治天賦的民族，不是優秀的民族。此外，一個民族，如果只會出清官、令人尊敬的公職人員、講信譽的商人、成果卓著的學者和技術人員、忠誠的奴僕，只會服從、只知忙於日常瑣事，也不是優秀民族。而只有具備了政治天賦的優

秀民族，才能擔當起推動世界發展的歷史重任。這是一個優秀民族應有的履行世俗事務的職責感。韋伯在其《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中，就把「職責」作為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核心思想進行了論述，從而成為韋伯的社會學和政治學理論的一個主要範疇。積極參與競爭、謀求實力以發展壯大自己、勇擔推動世界發展的重任，是這「職責」概念所反映的一些現實內容。

韋伯一再強調，作為一個優秀民族，德意志民族應該具有大民族的權力直覺和強權政治意識，努力使德國成為一個強大的帝國，從而使德國能夠與世界列強相抗衡，改變美、俄列強控制世界的格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時，韋伯甚至還預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出現的美國「和俄國一起分享霸權」的局面）。但是，改變和打破這一世界戰略格局，在韋伯看來，靠的不是炫耀武力、發動戰爭和佔領別國領土。韋伯當時就稱，吞併比利時的想法是「一種難以置信的瘋狂」；炫耀武力，結果是到處樹敵，促使列強聯合起來反對德國。因此，韋伯認為，德國要強盛、要能與世界列強抗衡，發揮作為世界強國的作用，是義不容辭的歷史重任；但是，要實現這一理想，靠的不是軍事，而是經濟。